



吉田松陰与 《海国図志》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4-1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洪, 偉民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24729/00004281">https://doi.org/10.24729/00004281</a>

## 吉田松阴与《海国图志》

洪偉民

### 一、序言

有关吉田松阴的研究有很多。据“吉田松阴历史馆”的统计，有关吉田松阴的著作，明治后半期20册、大正25册、昭和直至战败共有190册<sup>1</sup>。作为其初期的代表研究，有野口胜一·富冈政信共同编著的《吉田松阴传》<sup>2</sup>、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sup>3</sup>和国木田独步的《吉田松阴文》<sup>4</sup>等三册。

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了。该书以明治25年（1892）3月、在本乡教会堂举办的公演为基础、于同年5月至9月共分10次，在《国民之友》<sup>5</sup>进行了连载。在书中，他称松阴是“电火的革命家”<sup>6</sup>，“维新革命的一个急先锋”<sup>7</sup>，称其为引导明治维新的革命家。而国木田独步也在《吉田松阴文》里高度称其为“革命论者”、“革命先生”<sup>8</sup>。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吉田松阴形象被日本的政治体制所利用，战争期间作为臣民教育的手段，成为了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忠君爱国的“殉国教育家”、“忧国忠臣”的根源所在、法西斯的象征。这时，其尊王者的一面被强调、而其革命志士的一面则被抹消了。<sup>9</sup>

或许是对战争期间对吉田松阴的狂热吹捧的一种反动，战后至1951年，成为了吉田松阴研究的空白期。直至1951年，由奈良本辰也出版的《吉田松阴》<sup>10</sup>，开启了战后新的“人间松阴形象”的研究，并成为“松阴论”再检讨、再评价的出发点。此后至今，与吉田松阴有关的研究书籍大约出版了364种<sup>11</sup>。而中国有关吉田松阴的研究书籍，只有郭连友的《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sup>12</sup>一本。

但这些研究，很多是作为神一样被祭拜的“殉国教育家”、“忧国忠臣”的“松阴虚像”和“革命志士”、“革命家”的“松阴实像”的对比<sup>13</sup>。

<sup>1</sup> 这些数据是“吉田松阴历史馆”1998年统计出来的。另外，北海道大学的田中彰教授也做了类似的统计。只是，他在统计昭和至战败时期得出了145册的数字。

<sup>2</sup> 明治24年刊。

<sup>3</sup> 岩波クラシックス59、岩波書店、1984年。本书是以明治26年的初刊版本为基础复刻出版的。

<sup>4</sup> 『定本・国木田独步全集』第八卷所收、学習研究社、1977年。本书的初刊本是明治29年。

<sup>5</sup> 1887年，德富苏峰仿照美国《国民》杂志，创办《国民之友》杂志，编辑部取名“民友社”。《国民之友》的矛头所向是以当时的“鹿鸣馆”为代表的贵族欧洲化主义。该杂志第一期即集中攻击伊藤博文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照搬欧美的方针；第二期则在举国关注的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上，指出“外交之忧患不在外而在内”，所言正击中舆论的兴奋点，因而大受欢迎。《国民之友》由此一炮打响，第一期发行量达数万之多，连苏峰本人都感到意外。

<sup>6</sup> 前掲、《吉田松阴》、p. 19。

<sup>7</sup> 前掲、《吉田松阴》、p. 20。

<sup>8</sup> 前掲、『定本・国木田独步全集』第八卷所收〈吉田松阴文〉、p. 269。

<sup>9</sup> 有关这些研究，可参考上田庄三郎的『青年教師吉田松陰』、啓文社、1938年刊；福本義亮の『至誠殉国吉田松陰之末期』、誠文堂新光社、1940年刊；品川義介の『人間練成の吉田松陰』、東水社、1941年刊；広瀬豊の『教育の神吉田松陰』、武藏野書院、1941年刊；同氏の『勤皇の神吉田松陰』、日本青年教育会出版部、1943年刊；武田勘治の『不滅の人吉田松陰』、道統社、1941年刊；池田宣政の『殉国の人吉田松陰』、偕成社、1942年刊；村崎毅の『神国魂吉田松陰』、学習社、1942年刊；山中峰太郎の『黎明日本の炬火吉田松陰』、潮文閣、1942年刊；和田健爾の『吉田松陰殉国の精神』、京文社、1942年刊……等。战后对吉田松阴形象较为详细论述的，可以参照田中彰的『吉田松陰——変貌する人物像』一书。该书论述了从明治到大正、昭和前期至战败、中公新书、2001年刊。

<sup>10</sup> 岩波書店、1951年1月刊。

<sup>11</sup> 据“吉田松阴历史馆”的统计，战后至1998年共出版了64种。1998年至今的数据根据日本CINII 搜查得知。

<sup>12</sup>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

<sup>13</sup> 上述论述，参见郭连友的「日本における孟子の受容と吉田松陰の『革命思想』について」。源了円編『日中文化史叢書・思想』所收。又，有关「虚像」与「实像」的说法，脇英夫の「松陰の虚像と実像」、『ピエロタ』、1973年2月、18号所收；富成博の『吉田松陰』・「松陰の人間像」（長周新聞社、1988年3版、pp. 10

相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针对吉田松阴与《海国图志》的研究就少的多了。即使有,不少也是在论述中点到该书给予了吉田松阴以影响而已<sup>14</sup>。而比较多地进行了论述的,当属卢霞的《吉田松阴的近代化意识》一文。该文以鸦片战争为契口,从吉田松阴受魏源的《海国图志》影响、进而分析鸦片战争的教训,反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面临国家民族危机关头的所思和所想,进而透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前奏历史<sup>15</sup>。

虽然涉及到吉田松阴、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研究确实不少,但就吉田受《海国图志》影响的研究并不很多。本文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吉田松阴遗存下来的资料,尝试着做一探讨。

## 二、有关魏源《海国图志》的先行研究及其在中日不同的命运

中日学术界几乎都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是明治维新的推动力<sup>16</sup>。而有关《海国图志》和魏源的研究状况,中日都有不少。综合性的可以参见郭汉民、袁洪亮的《近二十年来〈海国图志〉研究回顾》<sup>17</sup>、李莉莉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魏源研究综述》<sup>18</sup>、夏剑钦的《魏源研究百年回眸》和《魏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sup>19</sup>、杨晋龙的《魏源研究的评价与反思》<sup>20</sup>、李纪祥的《近代观与西学观:魏源研究的多元面相与反思》<sup>21</sup>和李文明的《〈海国图志〉对日本影响新辩》<sup>22</sup>等。

李文明论文虽然不是综合性研究,但在前面有“先行研究”,将学界有关魏源与《海国图志》研究做了综合性的论述,指出:

1986年、1990年王晓秋先生发表题为《鸦片战争在日本的反响》和《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的论文,对‘《海国图志》影响日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海国图志》日本翻刻本的版本进行考察,王晓秋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之后国内的很多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在王晓秋论文框架内阐述的。……综合而言,学界关于《海国图志》的日本影响,尚存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海国图志》是否使日本产生了“睁眼看世界”的重大影响,其地理知识影响的程度究竟如何;二是《海国图志》在日本主要是“地理书”,还是“海防书”,哪方面的影响更为深刻<sup>23</sup>。

大谷敏夫则论述了日本学界对《海国图志》、林则徐、魏源的相关研究<sup>24</sup>。

~61。)里也有详细地分析。

<sup>14</sup> 比如,陈选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文史知识》、1982年10月;苗晓雨《〈海国图志〉生于中国受益于日本》、《民主与法制时报》、2011年8月15日第B05版;张爱芳《论魏源〈海国图志〉的编纂特点》、《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4卷、2012年3月;田得宏·张波《从〈海国图志〉看魏源的对外观念》、《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3月;郝玉松《〈海国图志〉的重要思想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8月第10卷第4期等。

<sup>15</sup> 卢霞《吉田松阴的近代化意识》、《日本研究》、2005年第5期,pp.92~95。

<sup>16</sup> 比如大谷敏夫《〈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p.51;李汉武《论魏源思想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影响》、《求索》、1987年12月,p.64;容应英《〈海国图志〉与日本明治维新》、《船山学刊》、1994年12月,p.62;刘世明《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之比较》、《理论导刊》、1991年11月,p.39;顾春《〈海国图志〉与日本》、《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8月等。日本比较著名的有源了円「幕末・維新时期における『海国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第9卷、1993年9月,pp.13~25;……等等。

<sup>17</sup> 《益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sup>18</sup> 《理论界》2007年第3期。

<sup>19</sup> 《求索》、2004年第7期;《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sup>20</sup> 《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sup>21</sup> 黄爱平、黄兴涛主编《西学与清代文化》所收,中华书局、2008年。

<sup>22</sup> 《东北亚学刊》、2017年11月。

<sup>23</sup> 前揭李文明《〈海国图志〉对日本影响新辩》,pp.52~53。

<sup>24</sup> 前揭《〈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pp.55~56。

由于单篇论文很多，这里就只介绍几篇。

首先，是源了圆的「幕末・維新时期における『海国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该文认为，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是明治维新前夜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众多书籍中特别受日本人欢迎、并给予很大影响的一本书。该书于1854年传入日本后仅三年，就被翻刻了23种和刻本，其中，16种是日语训读本，这就为不懂汉文的普通庶民提供方便。相对于日本人对此书的狂热态度，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书的无关心则成了鲜明的对照。

当时日本接受《海国图志》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吸收西洋的科学技术使日本完全独立；第二种是学习该书中的战法、战略以攘夷；第三种是学习西欧诸国的政治、法律、经济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各种卓越之点，以此达到日本开化之目的。

该论文认为其中的第一、第三种是比较重要的，论文以第一种为主进行论述。将魏源与佐久间象山（1811～1864）进行了比较。虽然两者之间并没有交接点，但两者都主张接受西欧科学文化，可以说，象山是魏源在海外的“同志”<sup>25</sup>。

尽管如此，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魏源仅仅只满足于购买各国的战舰、大炮；而象山则不满足于此，他试图模仿西欧的样式来制造大炮，并且为此自学了荷兰语。通过阅读用荷兰语撰写的制炮技术的书籍，成功地制造了大炮。

虽然象山很尊敬魏源，但他并没有采用《海国图志》里记叙的制炮技术。在象山看来，“魏氏海国图志中，辑铣炮之书，类皆粗漏无稽。如儿童戏嬉之为”<sup>26</sup>。佐久间象山是个兵学家，精通炮学，对魏源只强调坚壁清野、严防死守的战略主张并不同意，而提倡讲究炮、舰，主动出击于外海，对书中关于炮、舰之学谈得粗浅也提出了批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轻视技术的中国读书人与重视技能的日本武士文化之间的差别<sup>27</sup>。

而钱国红的「『天下』から世界へ：魏源の理想と戦略」一文分析了十九世纪清代知识人魏源的世界认识的变迁及其意义。认为魏源不仅注重于英国是如何成为十九世纪世界霸主的，更提出了要了解这个西洋最强国，必须放眼全球的主张。由此，魏源主张为了不被侵略首先必须吸收侵略者的长处、以此抵抗侵略者。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魏源放眼全球，悉数分析各国历史、地理及军事、政治等，同时还认为作为战略战术要利用各国间的利害关系，即所谓的“以夷款夷”。他还把目光放在了英国以外的国家，比如美国。认为美国更接近中国的立场、有着与中国想通的正义和理想。不仅地理环境与中国相似，在抵抗外来势力方面也与中国相似。他在《海国图志》第59卷直接引用了“华盛顿宣言”，赞美美国与英国的对立、美国从英国支配下的独立。这或许也是魏源不称英国为“英夷”、美国为“美夷”的原因吧。就是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地体验到了未曾有过的世界，从魏源开始，到洋务派、改良派的指导者们，一个个地将目光转向了西方世界，不仅是地理性的世界，更是追求精神世界的接点。由此开始了近代中国的世界认识。为了完成从“天下”向“世界”的转换，这些人一边驰骋在古代中国的大同理想里，一边又对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思想里注入了西洋思想的刺激，踏上了从自我中心的世界里脱出的困难的旅程。这样的摸索，作为近代中国人最初的“西洋发现”、或者作为对世界中的中国的存在方式的切实的问题，促使展开中国独自的新的世界认识<sup>28</sup>。

<sup>25</sup> 佐久间象山在1842年11月向幕府老中真田幸贯上书《海防八策》时，提出了与魏源相同的设想，所以他在读魏源的《圣武记》后不禁感慨，“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省蟹録】《象山全集》上卷、尚文館、1913年、pp. 13～14。转引自前掲《〈海国图志〉与日本》、p. 48。

<sup>26</sup> 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版、p. 28。转引自吴小玮《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月、p. 91。

<sup>27</sup> 源了円「幕末・維新时期における『海国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第9巻、1993年9月、pp. 13～25。

<sup>28</sup> 钱国红「『天下』から世界へ：魏源の理想と戦略」、《大妻比較文化：大妻女子大学比較文化学部紀要》

最后是顾春的《〈海国图志〉与日本》。该文引用了容应英、源了圀论文观点，从幕末日本知识分子阅读《海国图志》的体验为切入点，在分析其阅读感受及社会变革的主张之上，辨析与魏源变革思想的异同。指出这种异同与日本幕末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及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关联，也是《海国图志》得以在日本迅速普及并促成维新的基础。同时认为，不置可否的是日本维新的发生非在朝夕，不能脱离综合要素东向而望，正是幕末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强藩雄出幕府没落、兰学兴盛教育普及综合作用成就了《海国图志》的迅速推广和日本近代的社会转型<sup>29</sup>。关于日本接受《海国图志》的三种类型，顾春在源了圀论文的基础上认为：第一类主张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保持日本独立，占大多数，代表人物有岛津齐彬、川路圣谟、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村茂树等；第二类通过此书更加坚定了攘夷的信念，从书中获取攘夷之道，代表人物有破邪道的儒者安井息轩、攘夷派志士赖三树三等；第三类为从攘夷转向开国，并倡导积极的贸易论，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亦要全盘吸收西欧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结构、福利厚生等，这类人时而带有变革日本的倾向，代表人物有开明志士桥本左内、横井小楠等。其中第一、三类人数最多，好比我国的“洋务派”与“维新派”<sup>30</sup>。

上述几篇都是比较详尽论述魏源《海国图志》以及对中日不同影响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中日学者，对魏源《海国图志》给予日本幕末之士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魏源的《海国图志》为何而作、在中日的传播又是如何的呢？

魏源撰写此书的目的，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sup>31</sup>就是说要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制西方的侵略，而不要盲目的排外。因此，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sup>32</sup>。对付外国侵略者，如果“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因此，“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sup>33</sup>。可是，很遗憾的是，魏源的这个“以夷制夷”不能为大清所用，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华夷”思维意识中，对“外化”之地的东西不感兴趣。相反，魏源的这个思想倒是在日本很受欢迎。1854年日本就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sup>34</sup>，受到了日本的有识之士的欢迎，给当时幕末很多仁人志士很大的触动，吉田松阴也是其中的一个。

1839年（道光19）3月，林则徐为了禁烟，开始到广州与西方洋人有了接触，从中逐渐意识到需要了解西方、了解西方人。为此，他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sup>35</sup>，并令“抄齐统计数

第6卷，2005年，pp. 37~49。

<sup>29</sup> 前揭《〈海国图志〉与日本》，pp. 45~54。

<sup>30</sup> 前揭《〈海国图志〉与日本》，p. 48。

<sup>31</sup>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p. 1。又，雷文认同夏东元先生的论断，认为林则徐并未直接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观点，此种观点乃是魏源对林则徐思想的概括。但这种概括是非常符合林则徐本人思想特征的。雷平《“师夷长技以制夷”考论》、《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28卷第5期，p. 51。

<sup>32</sup> 前揭《海国图志》，p. 30。

<sup>33</sup> 前揭《海国图志》，p. 1093。

<sup>34</sup> 据大庭修的『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1967年）和『澳藩輸入の文化史』（研文出版、1997年）研究，《海国图志》最早带到日本的是嘉永4（1851）年由中国商船带来的3部，3部都通过奉行所被幕府（御文庫、学問所御用、老中牧野備前守忠雅）所购。翌年的嘉永5（1852）年，中国商船又带来了1部，为长崎会所所得。至嘉永7（1854）年，中国商船带来了12部，7部为幕府御用所得，其他5部流入了市场竞卖。转引自阿川修三『『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文教大学『言語と文化』第23号、2010年，p. 6。

<sup>35</sup> 1839年3月，林则徐钦差命到达广州，深感需要了解英国等西方，不久即下令搜集外国人在广州、澳门出版的各种报刊，如澳门的葡萄牙文《蜜蜂华报》（1822年创刊）、《澳门抄报》（1834年创办）、广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1832年创办）、《广州周报》（1835年创办）等等，精选外文翻译人员进行翻译，译出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命名为《澳门新闻纸》。《澳门新闻纸》现存六册，时间从1839年7月23日始至1840年1月7日止，历时一年零三个多月。其内容有政治、军事和贸易等方面的时事报道和评论，尤其是林则徐抵达广州后所采取的禁烟措施、施行的政策所引起的各方面强烈的反映和外国

本”、“借以采访夷情”<sup>36</sup>，并在给道光皇帝的奏章上说“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sup>37</sup>；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林则徐还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为《四洲志》。仅管如此，林则徐对西方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总体上来说，还未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比如他在给英王的照会中就说：“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天朝力震华夷”<sup>38</sup>。从语气上看，无疑透露出一种高在上上的“天朝”心态，以为若诺不得“大黄、茶叶、湖丝”则夷夷“无以为命”。这显然还没有真正地认识西方、认识西方的技术。不仅是林则徐，当时中国大多数所谓上层精英官僚都是这样的认识，以为天下唯有天朝、不识世界。比如，当时的广东巡抚黄恩形说：“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指英国）者，惟在通商”<sup>39</sup>。以为只要抓住“通商”这一要点，就可以“羁縻”和“控制”洋人了。可见当时的中国统治集团对世界、也对自己是多么地缺乏认识。正如 1900 年梁启超在《中国极弱溯源论》中论述的那样：“中国人向来不知其国之为国也。我国自古统一，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sup>40</sup>

可以说，1840 年 6 月开始的鸦片战争乃至最后的败战，彻底改变了林则徐的人生轨迹。这场战争对部分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魏源也是其中之一。1841 年 6 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败战受贬赴新疆伊犁途中，在江苏京口（镇江）会见了魏源。受林则徐之托，魏源在林则徐托付的《四洲志》译稿与《澳门日报》等资料的基础上，又收集征引了更多的国内外材料，于 1842（道光 22）年撰成《海国图志》五十卷，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主张。之后，魏源又对《海国图志》的五十卷本进行了补充修改，先后于 1847（道光 27）、1852（咸丰 2）年完成了六十卷本和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修改本。《海国图志》用“志”、“表”、“图”、“论”相结合的形式，为国人提供了当时最迫切需要了解的世界史地知识及现状的参考文献。全书共分六个部分：一是作为总纲的《筹海篇》，共二卷；二是各国地图，共二卷；三是分述各国历史地理情状，六十六卷；四是表，共三卷，即《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与《中国西洋纪年通表》；五是舆地总论，共三卷；六是《筹海总论》，共四卷，辑录各家关于沿海情形，及筹海方法之论说；七为《夷情备采》，共三卷，辑录《澳门月报》与林则徐之《华事夷言》。末附《筹炮图说》、《水电图说》、《战船图说》等，并配有各种地图 75 幅，西洋船、炮、器艺等图式 80 多幅、42 页，共十七卷。但该书自 1842 年第一部道光壬寅木活字本（五十卷本）问世后，至 1862 年的二十年间，虽然各地陆续重刊、重刻了五种不同版本的《海国图志》（据考，整个清代计有 12 种版本），却并未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因此，1847 年的时候，“我们从未在广州的各家书店听说过有这么一部书（指《海国图志》），我们唯一见过的副本，就是下面的评价所据以作出的那一套。它最初是上海的一位朋友弄到手的，然后有几天被我们的记者所占有，并被几位朋友当作一件奇物来传阅。后来，它又落入一位法国绅士手中，继而流传到欧洲去了。……我们希望不久能弄到一部，以便好好地读一读，那时也许就可以对它多发些议论了。……它在北京和各省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广泛发行，目的在于使他们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能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以这种半官方的方式，向他们灌输当前最高政府在对夷人的交往、贸易和夷人的科学等方面所持的观点”<sup>41</sup>。

人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点的分析，占了主要的篇幅。1840 年 10 月，林则徐被清廷革职，发配新疆，译报工作在一个多月之后停止。徐新平〈林则徐、魏源的译报活动及其思想再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第 15 卷第 6 期，pp. 30~31。

<sup>36</sup> 杨国祯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pp. 46~47。转引自前揭《“师夷长技以制夷”考论》、p. 52。

<sup>37</sup>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册，p. 765。转引自前揭《林则徐、魏源的译报活动及其思想再探讨》，p. 31。

<sup>38</sup>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一。中华书局、1959 年。转引自前揭《“师夷长技以制夷”考论》、p. 52。

<sup>39</sup> 《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p. 435。转引自刘世明《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之比较》、《理论导刊》、1991 年第 11 期，p. 39。

<sup>40</sup> 引自依田熹家《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p. 43。转引自前揭《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之比较》、p. 38。

<sup>41</sup> 语出 1847 年 9 月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又译《中国文库》)。《中国丛报》第 16 卷第 9 期的一篇对《海国图志》的书评。载《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在《海国图志》问世五年后，尚且“从未在广州的各家书店听说过有这么一部书”，这部著作的传播范围亦可见一斑。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曾向咸丰帝推荐《海国图志》时说：“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情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尤为详。……未审曾否得邀御览。如或未曾，乞飭左右购以进呈。”<sup>42</sup>当时，《海国图志》百卷本已问世六年，而王茂荫向咸丰帝推荐的却还是最早的五十卷本。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是普通百姓，即使是在最接近皇帝的官僚士大夫中间也未得到广泛流传。

不仅如此，即使是与魏源同时探索海外知识的人当中，也大有不认可魏源的。比如，梁廷枏就把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斥为“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sup>43</sup>，断然否定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其论以互市议款及师夷人长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无不笑且骇者”<sup>44</sup>。这些记载反映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思想在刊行之初不仅没有得到传统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反而遭受了各种的冷遇甚至讥讽。为此，他在《议战》中怒斥了这些墨守成规、反对师夷之人：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船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而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靡夷效颦，请攻印度而拒之，佛兰西、弥利坚愿助战舰，愿代请款而疑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sup>45</sup>

相对于《海国图志》刊行后数十年在本国的反应平平，其在本国的传播则是一番繁荣的景象。《海国图志》之所以在日本受欢迎，恐怕与如下理由有关<sup>46</sup>：

首先，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受东亚中国被英国打败的冲击后、被西方列强武力要求开国，因此，作为应对对手需要了解对方，就需要最新的、详细的世界地理知识。日本与中国不同，有新井白石以来的世界地理的研究，虽然有山村才助的《订正增译采览异言》，但其内容不是最新的，没有适合国内知识分子所需内容的。因此，虽也有以补充的形式接受西欧传教士写的地理、历史的汉译洋书，但几乎都偏向于英国、美国等地域的，其他的也都很简略。

而《海国图志》虽然不是汉译洋书，但却是以汉译洋书为底本的，且记叙详细，对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最要紧的是如何海防、和获得西洋优秀武器的知识。……《海国图志》并非单纯的世界地理书籍，有关海防和西洋武器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就像塩谷世弘在『海国图志』里说的「其实，武经大典也」（塩谷世弘「『海国图志』を翻案するの序」）那样，这点也是该书在幕末日本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其次，该书大受欢迎的原因是与编者魏源的共鸣。塩谷世弘称「忠智之士（魏源）、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探他邦。吾独不为默深（魏源）悲，併为清主悲」（塩谷世弘「『海国图志』を翻案するの序」）。至少，和刻本的校注者、翻译者由此共鸣的。

第三，本书使用汉文编写，这也符合幕末知识分子的读写能力。

pp. 433~442。转引自卢炳炜《论〈海国图志〉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pp. 99~100。

<sup>42</sup> 黄丽儒《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p. 232。转引自前掲《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p. 91。

<sup>43</sup>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5、中华书局、1959年、p. 172。转引自前掲《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p. 91。

<sup>44</sup>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七。引自杨杭军《走向近代化：清代嘉道咸时期中国社会走向》、2001年9月第1版、p. 398。转引自前掲《前教育现代化时期的落差——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为例》、p. 91。

<sup>45</sup>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p. 26。

<sup>46</sup> 前掲「『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pp. 9~10。

塩谷在《翻刻·海国图志·序》里说“夫地理既详、衷情既悉、器备既足，可以守则守焉，可以款则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所资。名为地志，其实武经大典，岂索索柳书所比”<sup>47</sup>，可见得他是把魏源的这部书看做是“兵书”的。与“不为其君用”的魏源不同，该书一传入日本就受到了日本各界的欢迎，并把它注释、训读以适合日本的读者阅读。据塩谷世弘「『海国图志』を翻案するの序」（塩谷世弘、箕作阮甫校訂・訓点『海国图志』「籌海篇」）记载<sup>48</sup>：

此書（『海国图志』）为客歲（昨年）清商始所舶載。左右衛門尉川路君（川路聖謨）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亟翻案。原刻不甚精。頗多譌（訛）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称則津山箕作库西注洋音於行間。…。

由此可以知道，这本书是塩谷世弘（1809～1867）受命于川路聖謨（1801～1868）进行校订、训读、箕作阮甫（1799～1863）对西洋地名、物品等注释片假名的。据『川路聖謨之生涯』<sup>49</sup>记载，川路借刚刚入库幕府书库的紅葉山文库的《海国图志》时，觉得该书是了解海外信息、知识的绝好的一本书，就向老中阿部正弘叙述了此书的益处，得到了阿部的许可后，由江户版元須原屋伊八出版。因此，该书的出版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而不是普通的民间出版社的出版物。

川路聖謨、塩谷世弘、箕作阮甫都是幕末著名人物。川路是幕末幕府官僚的杰出人物之一，官至勘定奉行，负责对外交涉，在对俄和亲条约缔结交涉与美国的通商条约缔结交涉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其工作与海防、外交有关，所以，他对《海国图志》感兴趣也是很自然的，由他计划出版该书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吧。

塩谷是幕末硕儒，曾作为浜松藩藩儒服务于水野忠邦，也是天保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面对欧洲列强，他积极研究海防、思考如何阻止对日本的侵略。因此，塩谷对该书重视，也是情有可原的。

而箕作阮甫则是幕末著名的津山藩藩医、兰学者，深受川路的信任。川路在长崎与俄罗斯使节普恰京进行外交交涉时，特意让其随行，并让他做随行翻译。因此，让箕作阮甫参与到由川路计划出版的《海国图志》中来，也就很理所当然的了。

可以说，《海国图志》就是在1853年美国佩理将军“黑船来袭”后形成的、当时最佳的三个拍档人合作出版的结果，通过注音、训读，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当时有更多的仁人志士阅读的。

其实，不仅是这三个人，当时包括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其他幕末的仁人志士热衷于此书，也不外乎该书能够提供很多西洋信息、战略战术、军事技术等，尤其是其中《筹海篇》，主要讲述海防等内容，正是当时很多人急于了解、知道的<sup>50</sup>。该书大受欢迎的理由，由此也可窥见一斑了。日本当时出版的大都不是全本，而是节选本、而且主要都是《筹海篇》、或与英美有关的篇幅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在《筹海篇》里，集中了他的攻夷、款夷、制夷的思想。因此，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所提出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sup>51</sup>。就是说，这近代对外政策的三大主义中，攻夷、款夷是权宜之计，而师夷才是转弱为强的根本大计。

<sup>47</sup> 盐谷岩阴《翻刻〈海国图志〉序》、1854年。转引自前掲顾春《〈海国图志〉与日本》、p. 47。

<sup>48</sup> 转引自前掲「『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p. 11。

<sup>49</sup> 川路寛堂編述『川路聖謨之生涯』（近代文芸・資料復刻叢書第八集、世界文庫、1970年。元版、1903年）。转引自前掲「『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pp. 11～12。

<sup>50</sup> 塩谷世弘「『海国图志』を翻案するの序」（嘉永七年六月）里说：「此の編は則ち欧人の撰に原づく。実を取りて信を伝ふ。而して精華の萃むる所は乃ち籌海、籌夷、戰艦、火攻の諸篇に在り。夫れ地理既に詳しく、衷情既に悉し、器備既に足り、以て守るべくは、則ち守り、以て戦ふべくは、則ち戦ひ、款すべきは則ち款す。之を左にし、之を右にす。惟だ其の資する所は、名は地志と為すも、其の實、武經大典なり。」转引自前掲「『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p. 13。

<sup>51</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9年、p. 323。

早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之前，也有一些其他的地理类的书籍传入日本，但一是没有那么详细，二是相对都比较陈旧<sup>52</sup>。19世纪初叶以来，日本也受到了西欧对待中国（大清）那样的逼迫，要求开国、开港。这时，日本的幕府志士与知识分子就非常渴望了解欧洲世界，对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带来的汉译洋书非常的欢迎。而且，他们将其中的大多数书都进行了汉文训读，便于一般不懂汉文的人阅读<sup>53</sup>。而且有些书的原刊本与和刊本的出版时间很近，可见得当时日本社会的仁人志士渴望了解外部世界。《海国图志》虽然不是直接来自海外图书翻译过来的，但因为是参考海外图书编撰的，同样受到了当时日本人的欢迎<sup>54</sup>。同时，还因为《海国图志》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仅仅只是地理书籍，在详细论及各国地理的同时，还用图的形式论及了海防、西洋军事技术（大炮、火药、军舰）等。比如，面对从海洋入侵的敌人应当如何击退等；不仅如此，还对西洋的武器、军舰（蒸汽机）等都有详细记载。在这60卷中，有近过半记载了各国的地理，也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筹海（海防）篇、仿造战船等海防与西洋军事技术<sup>55</sup>——这就是本书与其他地理书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 三、吉田松阴与《海国图志》

中日学界对魏源的《海国图志》给予日本的影响这一点基本都予以了正面的肯定。大谷甚正认为：

其影响，概括有三：一、这一著作，使“幕末”日本知道世界上有军事大国欧美列强的存在。二、这些列强，以武力为背景逼迫清朝对外开放，从而对奉行锁国的日本提出强大警告。三、日本出现了受这一著作启发的众多开明人物，他们形成了肩负明治维新事业的阶层。……成为明治维新原动力的日本开明派的多数，是属于“幕藩”体制下的幕府中的下级武士以及各藩中的下级武士。即：幕府中人：箕作阮甫、川路圣谟、岩潮忠震、大久保忠宽、胜海舟。各藩中人：（松代藩）佐久间象山；（肥后藩）横井小楠；（越前藩）桥本左内；（萨摩藩）西乡隆盛；（长州藩）高杉晋作、吉田松阴；（土佐藩）坂本龙马、中冈慎大郎等等。他们不是不能跟上激剧变动的政治、社会的上层武士，无宁说，是能吸取农、商、工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要求的人士。但是，由于他们毕竟是武士，曾对藩

<sup>52</sup> 前掲「『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pp. 1~2。

<sup>53</sup> 前掲「『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p. 2。

<sup>54</sup> 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受被革职的林则徐嘱托，并受其《四洲志》一部及其他相关资料，受托续编一部了解海外的著作。1842年，他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海志》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1847年刻本扩为60卷，1852（咸丰2）年，全书扩充至百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全书除了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础外，还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魏源亲自了解的材料。其中包括了外国人的著述，如英国人馬礼遜（Robert Morrison）『外国史略』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瑪吉士（マルケス）『地理備考』、其他如艾儒略（Julius Aleni）的『職方外記』、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的『坤輿圖說』、禱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的『地球圖說』、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的『東西每月統記伝』、郭實臘的『貿易通志』、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gran）的『美理哥国（合省）志略』、麦嘉締（Divie Bethune McCartee）的『平安通書』……等20余种左右的著作。参见拙文《吉田松阴对〈孟子〉的受容——以〈讲孟余话〉为中心》、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编《人文学会集》第34号、2016年3月、pp.173-188。

<sup>55</sup> 阿川论文记载了60卷的目录：「卷一 籌海篇 卷二 図（地図） 第三~七 東南洋（東南アジア）海岸之国 第八~十二 東南洋海島各国 卷十三~十九 西南洋諸国 卷二十~二十三 小西洋（北アフリカ）卷二十四~三十五 大西洋 歐羅巴（ヨーロッパ）洲 卷三十六~三十八 北洋 卷三十九~四十三 外大西洋墨利加（アメリカ）洲 卷四十四、四十五 表 卷四十六、四十七 国地総論上下 卷四十八~五十 籌海総論上中下 卷五十一、五十二 夷情備采 卷五十三 仿造戰船諸議 卷五十四 火輪船図説 卷五十五 鑄鐵模説 仿鑄洋礮説 炸彈飛礮説 礮車礮架図説 卷五十六 西洋用礮測量説 西洋礮台図説 礮台旁設重礮説 卷五十七 西洋自来火説 仿造西洋火藥法 卷五十八 攻船水雷図説 用地雷法 卷五十九 西洋器器雜述 卷六十 西洋遠鏡作法」。前掲「『海国图志』と日本：塩谷世弘、箕作阮甫の訓点本について」、pp. 3~4。

主宣誓忠诚,改革仅止于以体制范围之内为目标.只是由于时代进一步在前进,才使他们转而成为争取在绝对天皇制主义之下重建政权的集团<sup>60</sup>。

与中国的维新变法不同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由当时的下级武士进行的由下而上的维新革命。箕作阮甫、川路圣謩在前面已经讲到过;佐久间象山、胜海舟、横井小楠、桥本左内、高杉晋作、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等等,都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绕不开的人物。其中的吉田松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明治维新,但他的思想影响了不少学生门人和朋友,成为明治维新的急先锋。

### 1. 吉田松阴接触《海国图志》

1840年开始的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下《南京条约》,迫使闭关锁国的大清开放门户。十余年后的1853(嘉永6)年,美国的佩理率军舰来港,逼日本开国,幕府无奈,要求一年后予以答复。史称“黑船来袭”。幕末当时的日本有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但吉田松阴觉得光担心、愤怒无济于事。于是上书《将及私言》<sup>57</sup>等,献给藩主。翌年,安政元年(1854)佩理又率七艘军舰开进浦贺,逼迫幕府答复。期间,幕府曾考虑选派青年俊才留学海外,佐久间象山为此也曾向幕府推荐了包括吉田松阴在内的十几名青年俊才,但未被采纳。因此,佐久间就让吉田以漂流的方式出国,但吉田觉得“漂流”虽然可以免去“海禁”之罪,但有“欺骗”之嫌,自己想出海、了解世界大势并无不妥、是正当的事情不必躲躲藏藏,所以没有答应,而是冒着违反“海禁”的危险,登上了已离开浦贺、停靠在下田的美国军舰,与美军正面交涉,意图坐美舰出国,被拒后与同行的金子重辅去长崎奉行所自首。史称“下田事件”。1858年上半年,美国政府迫使幕府政权同意《日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向美国开放五个港口。松阴感于幕府的软弱,上书《时事论》,意在唤起有识之士尊王攘夷,中兴日本,以免蹈大清之覆辙;未被采纳。又意图刺杀幕府阁僚间部詮胜,事败被捕。1859年10月27日被处刑,年仅29岁<sup>58</sup>。

《海国图志》60卷本于1851年传入日本,增补的百卷本也于1854年输入日本。1854~1856年,日本出版了21种不同版本的《海国图志》选本<sup>59</sup>。由于这段时期正好是美国佩理将军率军舰兵临日本、逼迫日本开港的前后之际,这就为形成日本各界重视《海国图志》时代提供了现实需要和可能,无论是《筹海篇》中对鸦片战争的经验总结,还是其它各卷中对欧洲诸国特别是美国、俄罗斯、英国等的系统叙述,对当时的日本而言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854年4月,《海国图志墨利加洲部》出版,这是日本出版的第一部《海国图志》选本;随后出版的是幕末著名儒学者盐谷宕阴训读的《翻刻海国图志》(筹海篇部分),兰学者箕作阮甫则注释了书中的人名、国名等西方名词。随着以上两种选本的问世,《海国图志》的其它选本也相继出现。几乎与此同时,吉田松阴欲登上停留在下田的美舰,被拒后自首入狱,自此开始了年余的幽囚生涯。在狱中,他为囚人讲解《孟子》;出狱后继续在“松下村塾”讲解《孟子》,前后约年余。后将讲稿结集,取名《讲孟箴记》,遂又改名《讲孟余话》。从松下村塾走出去的大批门人中,很多都成为后来的维新人才,可以说松阴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人才储备。

### 2. 吉田松阴对《海国图志》的评价

在狱中,松阴写成了《野山狱文稿》,其中有《读筹海篇》<sup>60</sup>、《读甲寅伦敦评判记》<sup>61</sup>两

<sup>56</sup> 前揭《〈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p. 51。

<sup>57</sup> 山口县教育会编纂《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猛省录》所收,pp. 287~326。岩波书店普及版、1940年。下称《全集》(普及版)。《将及私言》以外,还包括了另外的《急务条约》、《海战策》、《急务策》、《急务则》等四策。

<sup>58</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吉田松阴年谱》。

<sup>59</sup>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pp. 33~34。转引自李存朴《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国图志〉时代》、《安徽史学》、2002年第二期, p. 34。

<sup>60</sup> 《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 36。

<sup>61</sup> 《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 51。

篇是直接与魏源《海国图志》有关的。从时间上推算，两篇都是1855年写成的，正好是在《海国图志》在日本正式刊行之后的事。《读筹海篇》篇首有注记“清魏源《海国图志》首篇”的文字，可以断定，松阴当时读的是盐谷宕阴训读的《翻刻海国图志》（筹海篇部分）。

从松阴对《海国图志》的评价来看，并未如其师佐久间象山那样，视魏源为海外“同志”，也没有象学界所说的那样受到了魏源的很大影响。毋宁说吉田松阴不仅没有受到魏源的影响，而且对他的有些观点持反对的意见。下面是松阴的《读〈筹海篇〉（清魏源〈海国图志〉首篇）》<sup>62</sup>：

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鑿鑿中窾，使清尽用之，固足以制英寇而取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致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者，非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耶？世之议守者，不过于筑坚墩、铸巨礮、调客兵；议战者，不能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不得已。是皆默深所深忧也。而清乃为之，姑息以养夷谋，胶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且默深言“匪徒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裨将才、其所属皆精兵。而自文法之吏视之，为乱民、为汉奸，收以不为用”。然则广西之乱，默深其已知之也。噫，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悲哉！五月四日。

这里的鲁，是指俄罗斯；拂是指法兰西。魏源的《海国图志》首篇讲的是“海防”，也可以说是魏源对鸦片战争战败后的一个反省。日本各界当然对此如获至宝，期望能从中得到一点借鉴与启示。

但是，吉田松阴开卷第一篇就予以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按说魏源《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如果清廷都能采用，足以抵挡西洋诸国。可是外患尚未解除，民变却又发生。可见“清之所宜为虑者，非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耶”？在松阴看来，作为服务于清朝政府的知识分子的魏源只是说了如何“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sup>63</sup>之事，却绝口没有向政府尽言如何治理民众，这使得吉田松阴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松阴为什么会觉得“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的呢？

魏源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他亲眼目睹了英国是如何靠“船坚炮利”逞强致胜的。因此，才会切身认识到，要想抗御外来侵略，富强国家，就必须“尽得西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因此积极主张“师夷”。尽管“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刻日月薄蝓，阴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暑刻，不亚西土，至罗城壶漏则刻自中国，而后西行”，但他也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和西方的长技，意识到“天下有不可强者三：有其人，无其材，一难也；有其材，无其人，二难也；有其人，有其材，无其材（谓材料），三难也”<sup>64</sup>的事实，因此，需要“师夷”学习西方“长技”。

虽然魏源看到了自己的短处，也提出了人、财（才）、物的不足，但在松阴看来，对于如何治理民众、如何上下一心抗击外敌，却没有实质性的策略，乃至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至今已有一、四年（指吉田松阴看到的60卷本），却仍然发生民变。这对吉田松阴来说，不仅是简单的“独疑”、而是“悲哉”了。

他在给赤川淡水的信里说：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州。所谓中华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州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可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

<sup>62</sup> 《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p. 36~37。

<sup>63</sup> 前揭《海国图志》、p. 1。

<sup>64</sup> 前揭《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卷二、p. 29。

常。然至如蒙古、满州，人心犹或知恶之，是洪钱（洪秀全）之所以煽其民也。夫洪钱者，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州贼，其名可谓正也。满州，一统天子，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也。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从孰为正？从孰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sup>65</sup>

吉田松阴批判了中国人自尊为“中华”、视外国为“犬羊”的自大心理，可即便如此，正统的“中华”还是不断地被更换，一会儿是蒙古、一会儿是满清。君臣父子、礼义廉耻信的儒学正统都被践踏了。而且都已“习以为常”了。洪秀全就是利用了这种不满心理，“所以煽其民也”。因此，洪秀全是“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州贼，其名可谓正也”。在松阴看来，满清是异民族，清军入关窃取了汉民族的政治统治大权，太平军起兵反满是“正统”；但“满州，一统天子，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也”。满清是正统的王朝，太平军是其治下的臣民，其举兵反满即使叛乱、谋反，所以，清政府的镇压是“正统”<sup>66</sup>。但到底谁是“正统”？谁是“叛逆”？这才是吉田松阴“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之处。

实际上，吉田松阴批判传统中国儒学已很久了。当时松阴正好因“下田事件”入狱，而后在狱中开始了讲解《孟子》，出狱后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前后约一年余。其讲课内容后辑集成《讲孟余话》，这是松阴对《孟子》思想批判的很重要的部分。此书后来呈送当时的大儒山县太华求教，不想遭到了山县的批评。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王道——霸道之争”。

我们来看看吉田松阴面对欧美列强是如何论述的。

在第一讲里，针对“孟柯，邹人也。游事齐宣王梁惠王”一句，他批评道：

孔孟离生国，给事他国不济。凡君父，其义一也。愚昏我君，去生国而往他求君，齐于玩愚我父而离家，父邻家之翁矣。……或曰、孔孟之道大也，兼欲善天下，何必自国焉。且得明君贤主，行我道时，天下共蒙其泽，我生国固不在其外。曰、欲善天下而去我国，同欲治国而不修身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序，决非可乱。……尧舜让其位于他人，汤武放伐其主，无害于圣人。我邦上自天朝下至列藩迄，千万世々袭而不绝，非汉土等可比。故汉土之臣纵如半季渡之奴婢，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故其所也。我邦之臣为谱第之臣，与主人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决无可弃主而去之道。呜呼，我父母何国人焉，我衣食何国之物焉。读书、知道，亦谁思焉。今少以不遇主，忽然去是，于人心如何。我起孔孟，欲与此论义<sup>67</sup>。

吉田松阴在这里批判了孔孟之道，认为离开自己的国家去服务他国之君，就如同离开生养自己的家而去认邻家之翁为父一样。有人说“孔孟之道之大，何必拘泥于本国。况且遇到明君贤主，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不也可以惠泽天下，当然包括自己的国家”。吉田却认为，想要治理天下却又离开自己的故土，如同想要治理国家却不知道自我修身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这种“大学之序，决非可乱”。因此，他说：“不爱敬其亲而爱敬他人，《孝经》云悖德悖礼。”<sup>68</sup>他强调了中国不同于日本的“国体”是：日本是没有“尧舜让其位于他人、汤武放伐其主”的“万世一系”和臣民与君主的“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绝无可弃主而去”的“君臣一体、忠孝一致”的国体。中国的臣子可以如家里的奴婢一样按季节、时期择其主子之

<sup>65</sup> 「赤川淡水に与ふる書」、『野山獄文稿』所收、《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p. 13~14。日语中“支那”指中国，原本并无贬义。二战中对华蔑称而不再使用。这里为了保持原文的统一性，仍用其“支那”之说。下同。

<sup>66</sup> 鲁霞论文认为：吉田松阴从儒学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洪秀全是正统；从封建统治立场出发，认为满清是正统。在吉田松阴的思维中，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违背儒学“忠孝之训”思想的沉淀，才导致了太平军借此机会煽动民众。他据此提出儒学的大义在中国已被彻底破坏，儒学真正的精髓在日本，而日本的儒学又只能是在神道下起辅助性作用的儒学。前揭《吉田松阴的近代化意识》、pp. 93~94。

<sup>67</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p. 18~20。

<sup>68</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 47。

善恶而转移，而日本则万万不可。因此，他说“今少以不遇主，忽然去是，于人心如何”？这也许就是日本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将军掌握实权而始终没有篡位的“万世一系”现象的原因所在吧。

吉田松阴针对孔孟周游列国之事予以了否定，更是批判了孟子的“良禽择木而栖”的观点，因此，他才会发出“今少以不遇主，忽然去是，于人心如何”的疑问。

那么，如果君主（天子）有不对的地方呢？吉田松阴同样认为，日本“从天下臣民来看，如天皇那样值得尊敬的人没有了；从天皇那里看，天下没有如臣民那样宝贵的人了”，这种臣民关系，自开国以来，“未曾有分开过一天”。<sup>69</sup>

同时，他在评点门人斋藤荣藏的文章时还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者，是支那人语也。支那即然，在神州断々不然也。仅案、我大八州所肇皇祖，传给万世子孙，无穷天壤者，非他人可觊觎也。其一人之天下亦明也。……如出汤武者放伐之举，虽其心仁也，虽其为义也，……绝非神州人也。而神州之民，尚何与之？……万一有如支那所谓诛君弑民者，虎狼豺犀，绝非人类也。故曰：“天下，一人之天下。”而其云非一人之天下者，特支那人语耳。然虽普天率土之民，皆以天下为己任，尽死以仕天子，不以贵贱尊卑为之隔限。是则神州之道也。<sup>70</sup>

在这里松阴明确指出了日本是“天下是一人”的，“天下非一人”之说只是中国人的说法。日本人无论“贵贱尊卑”，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尽死以仕天子”；如果看着欧美列强欺负日本而无动于衷，则其罪犹胜于“逆贼”百倍<sup>71</sup>。因此，日本国家的兴废盛衰都在天皇。如果国家因此而陷入不幸，那也是没有办法的。这时候如果象中国一样进行禅让放伐革命的话，那就不是日本人。日本人即使国家灭亡也必须信奉天皇一个人的命令<sup>72</sup>。天下臣民只要做到尽忠天皇（天子）即可。“天皇的不可侵论”在“忠”的前提下被成立、君臣关系也被赋予了臣子、臣民对天皇（天子）的绝对“忠诚”了。

因此，松阴才会认为，国家遭难时，即使山县太华先生去别国奉仕君主，我也是绝不会这样做的<sup>73</sup>。在他看来，“如支那所谓诛君弑民者，虎狼豺犀，绝非人类也”。正因为这样，松阴才会觉得“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民变”消除了，才能上下同心、抗击外敌。中国动不动就“民变”造成的“内患”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松阴才会觉得面对“蛮夷”，“阖国之人人为阖国而死，阖藩之人人为阖藩而死，臣为君而死，子为父而死之志确乎，何畏诸蛮也”<sup>74</sup>。

清朝的被殖民现状，就是因为像孔孟那样“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离开自己的出生国去他国事君、即对君不忠的结果引起的。

朝廷失权，罪在摄关将军；摄关专权，罪在其官属；将军攘权，罪在其臣仆。……诚人人各守其道，而远其罪，则君者以诚其臣、臣者以谏其君、长者以饬其属、属者以规其长、父者以训其子、子者以劝其父、智以喻愚、贤以导不肖，谋虑之长，积累之渐，上自摄关将军，下至农工商贾，终当归之。<sup>75</sup>

<sup>69</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 463。

<sup>70</sup> 「天下は一人の天下に非ざるの説」、<丙辰幽室文稿>、《全集》第四卷、pp. 139~141。

<sup>71</sup> 《讲孟余话》<告子上>：坐视四夷跋扈者，其罪比逆贼重百等也。吾与其人不共戴天。《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 320。

<sup>72</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 32。

<sup>73</sup> 「国家他日有变难时，先生去事他国心甘哉？如我虽死万万不能。」「講孟節記評語の反評」、《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 550。

<sup>74</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 20。

<sup>75</sup> 「浄土真宗清狂師の本山に应徴するを送る序」、<丙辰幽室文稿>、《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 158。

在吉田松阴看来，社会各界，人人做好自己的事，中心回归朝廷、天子才是正道。朝廷失权、失责，那不是朝廷没有做好、有责任，而是社会各界没有做好，责任都在下面。这与中国的“放伐革命”完全不同的思维。

同样的话题，他在《尽心·上》“第三章”里也说<sup>76</sup>：

国家衰乱，夷狄猖獗，下民云天命、云时运，或可济。在上之人以衰乱·猖獗·诱以时运、天命，大误也。以是推之，幕府大名有幕府大名之职，士大夫有士大夫之职，农工商有农工商之职。各于其职之上，决不可言天命、时运。鼓腹太平之士常言“今之士不能如昔之士勇猛也，是时运也”等。余甚恶其言。自废己职，附是时运、天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皆为时运、天命也。何得不恶是耶？余以意言是，国家夷狄之事，固在君相之职。生于神州者，普天率土之万民，皆不可不为自职矣。……吾虽幽囚之罪人，恶忍置于国家衰乱、夷狄猖獗之度外耶。於诸君如何？

吉田松阴针对《孟子·尽心》第二章的“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说明“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区别<sup>77</sup>。认为“‘在我者’是仁义礼之类，‘在外者’是富贵利达之类”，很多“在我者”的人明明可以求得而不求、却怪这“是命也”；而“在外者”即使求得也求不到，却还用尽各种手段与智慧地去求之仍不得，这些都是“不知正命之故”<sup>78</sup>。因此，他觉得，国家衰乱、夷狄猖獗，百姓可以说是“天命”、“时运”，但上面的人也这么认为就是“大误”、就是不知“正命”了。所以，幕府大名有幕府大名之职责，士大夫有士大夫之职责，农工商有农工商之职责。各界之人都要各司其责，决不可轻言“天命·时运”。有些讴歌太平的武士说“现在的武士没有过去的武士那样的勇猛了，这也是时运呀”云云，松阴“甚恶其言”，认为，自己放弃责任、不尽心尽力却怪说是“时运”的话，那无论怎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会归咎于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时运·天命”的了。吉田松阴由此而言，认为国家和外敌的事情，虽然是君主、大臣的职责，但生为日本人，天下万民谁都应该把它看作是自己份内的事情。即使“如我这样的有罪之人，面对国家衰乱、外敌猖獗，又岂能置之度外？诸君以为如何呢”？

松阴在狱中讲解《孟子》的初衷，原本就是要唤醒整天在牢里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囚徒众人，通过讲解《孟子》，希望能让这些囚人认识到日本的时局、自己的责任。因此，经常以自己的囚人身份来做比喻。尤其是他特别指出平民百姓也可以不畏生死、尽忠保国，提出了新兴的君臣（君民）关系。比如，他说武士为了国家应该“尽死以仕天子”<sup>79</sup>、要不惜生命，“虽死犹生”<sup>80</sup>，但他更认为即使是平民百姓、甚至是囚人，只要是“为了国家不惜牺牲生命者，虽没有技艺也是武士；即使有技艺，但不肯为国牺牲者绝非武士”<sup>81</sup>。

这里，我们看到了吉田松阴的日本人谁都“可以为国家不惜牺牲生命”的观点，他把原本只有武士才能做到的职责推介到了所有人的身上，而且赋予了“武士”以新的概念——为国牺牲者，即使没有技艺也是武士；不肯为国牺牲者，即使有技艺也不是武士。

在讲解“不素餐兮”<sup>82</sup>一章里，他也说道：

盖农耕、工制家宅器皿、商交易有无，各有其职而益国。士之仕者，家老有家老之

<sup>76</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p. 378~379。

<sup>77</sup> 《孟子·尽心·上》“第三章”：“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sup>78</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p. 377~378。

<sup>79</sup> 「天下は一人の天下に非ざるの説」、『丙辰室文稿』、『全集』第四卷、p. 141。

<sup>80</sup> 「爰書の後に書す」、『丙辰室文稿』、『全集』第四卷、p. 102。

<sup>81</sup> 『全集』（普及版）第三卷、p. 327。

<sup>82</sup> 《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二章”：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职，奉行有奉行之职，藩头有藩头之职，物头有物头之职，有治民之职，有理财之职，亦各有所事。独平士上未有任职，下又无农工商之职，颇拟素餐耶。然大不然。其身居仁，其行由义。其君用之，固使其国安富尊荣；又云其君不用，其子弟从遊是。子成孝子，弟成悌弟，人之交成忠信也。故平士之职，应以一身之修治为本、一世之风俗为己任。然其“不素餐”之功，岂是农、工、商可比哉<sup>83</sup>。

吉田松阴在这里给予了武士以很高的评价，他们看似不像农工商那样有具体的工作，但一旦君主（国家）用他，就要使国家安定富饶；即使不用他，他也能为青年做出表率，让他们知道孝悌、与人忠信。因此，他们必须以修身为本、以诱导世俗风气为己任。这样，其功绩岂是一般的农工商可比？也就不枉拿其“俸禄”了。

既然传统武士有此责任，那么全民都是“武士”呢？所以，松阴发出了“谁都可以是武士”的感叹。这就是吉田松阴的眼界。

他在解释“居移气、养移体”<sup>84</sup>时说：

余、幽闭于一间之室，日夜谋吞并五大洲。人无不皆笑其狂妄。是他人之笑者，以其居所狭窄、不若余居之广大也。吾邦海禁之严也，天下之人，六十六国之外，不得寸板下海。故其所覩，仅止六十六国，可云狭窄。余、独傲睨一室、达观古今、通视万国，是以不觉不知得致广大，盖非余与他人有智能之大小，独有其居之广狭耳。今欧罗巴·米利幹之夷辈，欲梯航万国，合宇内为一，是又非在其智能过人，唯以其大艦巨舶，以万国比邻之故能然。其居成广大之效也。今使六十六国之人梯航万国，亦何忧其狭窄耶？欧罗巴·米利幹亦何足云耶？大哉居矣。夫“居移气、养移体”者，常人之论也。至居天下广居者，亦非能居·养之所移。待梯航万国，始致广大者常人也。如余幽囚于一室而致广大者，学力耳<sup>85</sup>。

吉田松阴在这里说：我幽囚于一室，日夜谋划着合并五大洲之事。听说此事的人都笑我是狂妄之人。那些笑我者，无非是说自己的居所狭窄，不若我之广大。我国海禁既出，不能外出。其眼界，唯国内而已，非常狭窄。而我虽然幽居一室，傲然达观古今、通视全世界，不知不觉感觉居住得广大了。想起来也不是我与他人之间有什么智能之差，唯有使居住之广、狭之别罢了。如今欧洲、美国人航行全世界，企图把全世界都当作自己的家里的。这也不是其智能过人，唯其有比邻国更多大艦巨舶而已，所以能成广大之效罢了。倘使让我们也能航行全世界，其居住的大小岂能成为问题，欧洲、美国何足挂齿？“居住改变人的气象、营养改变人的体格”，这只是一般人的议论，如果成为“居天下之广居”、把全世界都当作自己的居住地的人的话，并不能得到由其居住与营养改变其心。等到航行万国后，方知成广大者也是常人。我幽囚于一室而能成为广大者，全赖于学识的能力啊。

“居一室而通世界”、“居一室而知天下”，这就是吉田松阴要求天下臣民都要做到的。幽囚之人尚且能胸怀天下，自由之人且能碌碌无为？这就是吉田在狱中为囚人讲解《孟子》的理由，哪怕囚禁在牢里，也照样可以为国家大事操心、出谋划策。同时，他还指出了，欧美之所以能“航行世界”，不过是他们有“大艦巨舶”，日本只要“开国”、走出去，照样可以“航行世界”，如此，欧美何惧只有？居住地的大小哪里是问题？松阴的开国思维在这里也可以窥视一斑。

吉田松阴与魏源最大的不同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多少有些纸上谈兵，尤其是最初的

<sup>83</sup> 《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 418。

<sup>84</sup> 《孟子·尽心·上》“第三十二章”：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子之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垆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sup>85</sup> 《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p. 424~425。

50卷本，很多还都是很笼统地一些说法，没有具体地操作方法。至于平民百姓应该如何，却绝口不提。而松阴无论在《讲孟余话》，还是与友人、门生的信件来往中，都有不少提到如何抗击欧美列强、作为臣民应该如何去做、等等。自己虽然是个“戴罪之人”，但同样可以“尽自己的责”而不能“置身度外”，这或许就是吉田松阴对魏源置于“内患”而“无一言及于此”的疑虑吧。

因为天下臣民想的不是如何上下一致抗击外敌，而是如何“良禽择木而栖”、如何取而代之的“放伐革命”，内忧既不除，外患当然无法抵挡。所以，松阴才会觉得“清之所宜为虑者，非在外夷，而在内民也”的吧。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吉田松阴对魏源的另一篇批评文。

#### 读甲寅伦敦评判记<sup>86</sup>

清人魏源喜论外国事情。谓鲁与墨与拂，皆恶于暗，宜收以为水陆之援。援古事而指今事，凿凿有据。然以吾视之，是知一而未知二者耳。凡夷狄之情，见利不见义。苟利，则敌仇亦为同盟；苟害，则同盟亦为敌仇。是其常也。今读此记，鲁与杜开募，暗拂诸国，合谋助杜拒之，然则鲁暗交恶，如源所计，而暗拂合谋，则出其计外。而源未知墨之于诸国，亦复何如也。昔者，丰公征韩，明人或议，公平氏、岛津乃源氏也。平·源自古相恶，至公又击源，其隙益深。是宜引源以攻平。由我言之，则其中不肯繁，无论耳。然彼之间盖或以为然。

汉土之人，自古於外国之事茫然而不讲，反以臆断之。如源自固汉土人之翹楚也，而未能免其陋焉。抑论敌当审己，故立国之体，无如使人待于我，而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啗我也。方今鲁墨暗拂，交来我国，魏源之书大行我国。吾读此记，深有感，故书。乙卯七月。

吉田松阴在这里说的是，魏源说俄罗斯、美国、法国都与英国交恶，所以，中国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来获取水陆援助。这是魏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但凡西洋夷人之行事风格，是“见利不见义。苟利，则敌仇亦为同盟；苟害，则同盟亦为敌仇”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晓外国事，反而喜欢臆断。魏源算是中原翹楚之人，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魏源在写英国历史时就分析其与其他国家的均势关系，认为：“西海诸国最强而大者为英吉利所畏者，一曰米利坚（指美国）……二曰佛兰西（指法国），皆地土大于英吉利，而船炮如之，亦好贸易……诸国皆不相统属，荷兰颇为英吉利欺凌，每倚佛兰西为援，则与英吉利固外好而阴忌之，未必听英吉利越其国而与俄罗斯贸易。”<sup>87</sup>

另外，他在介绍美国历史的总叙中又评述道：“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开创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sup>88</sup>

英、法、美之间矛盾历来已久。“自明季国初之际，佛兰西开垦弥利坚东北地，置城夷，设市埠，英夷突攻夺之，于是佛夷与英夷深仇，及后英夷横征暴敛，于足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兼约费兰西为援，三国兵船数百艘，水陆数十万，不解甲者数载，弥利坚断其饷道，英军饥困，割地请和，弥利坚遂尽复故地二十七部，英夷止守东北隅四部，不敢再犯”。<sup>89</sup>

另外，魏源在《海国图志》开篇《筹海篇·议守》中还讲到：“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谓

<sup>86</sup> 《全集》（普及版）第四卷、pp. 51~52。文中的鲁指俄罗斯；墨指美国；拂指法兰西；土指土耳其；暗指英国。

<sup>87</sup> 前揭《海国图志》、p. 1468。

<sup>88</sup> 前揭《海国图志》、p. 1611。

<sup>89</sup> 前揭《海国图志》、p. 25。

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sup>90</sup>。这些都是魏源觉得利用敌国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作为以守为战的方法之一的。但吉田松阴却觉得魏源太想当然了。英、美、法、俄之间原本就各有利益，相互利用，错综复杂。“鲁（俄罗斯）与杜（土耳其）开寡，暗（英国）拂（法国）诸国，合谋助杜拒之”，——要知道，英国、法国可是冤家死对头，可是为了共同的敌人，他们可以联手帮助土耳其抗击俄罗斯。所以，“鲁（俄罗斯）暗（英国）交恶”，这是魏源想到的；但“暗（英国）拂（法国）合谋”，却是魏源没想到的。而魏源更不知美国之于诸国会如何了。总体上说，魏源也知道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互相可以利用。但松阴恰恰指出了西洋诸国，原本源自于各自的利益，互相利用，敌、友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他们之间矛盾再大，一旦遇到你更弱的，就会一致对你，你这个时候还期望他们来帮你，就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松阴认为，大敌当前，不能心存幻想，“立国之体，无如使人待于我，而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啖我也”。他从义利观出发，对所谓的敌我、盟友看得很清楚，发出了“无如使人待于我，而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啖我”的呼声。

那么，吉田松阴为什么会这么认为的呢？

清朝鸦片战争战败的消息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社会各阶层冲击巨大，当时的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在写给川路圣谟的信中就表示：“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sup>91</sup>。吉田松阴也不例外，早在他看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前，当他知道美国佩理率舰来日本要求开国之后，就上书了《将及私言》等，提出了自己的对外主张。

他在《将及私言》〈船舰〉里说：

船舰之制，仿西洋之便，诸家之说，累累也。然终未公然用其说者。或有其志而未果、或果而未公然。今般，切考夷之计何出，若及战争时，先第一乘取伊豆诸岛使足溜，犹可如英吉利之取清之定海县<sup>92</sup>。

这里的诸家之说，说的是古贺侗菴的《海防臆测》、会泽正志斋的《新论》、盐谷岩阴的《筹海私议》、佐久间象山的《外船议》等。吉田松阴在这里说的是，关于船舰仿造之事，诸家之说很多，但若战争来临，则首先应该占取伊豆诸岛，如同英国之取大清的定海县。

鸦片战争开始不久，英国即攻克定海，作为进攻大清的据点。因此，松阴设想了一旦日本也发生了西洋入侵之事，首先应该象英国占据大清的定海作为据点、而后北上进一步入侵中国全图一样，占据伊豆半岛这个要点。

接着他又在《将及私言》〈马法〉里又说：

马兵之战有益，大也。然马为易惊之物，未常善调练于是，徒无益耳，其为害亦甚矣。……西洋诸国专用骑兵，战得大利。今真至调练于是，其法亦可行我者多矣。宜选其长术者，大兴骑操。此事亦不可不急。

这里，松阴讲述了骑兵。战马的重要性。虽然调教得不好“徒无益”，但西洋诸国专用骑兵，且战得大利。因此，松阴认为日本应该尽快组建骑兵队。

面对“黑船来袭”，他在《幽囚录》里说：

幕府大修武备，先除大船之禁，命兰夷使致军舰、火轮船，命浦贺与力中岛三郎助依洋书打造军舰，筑礮台于品海，铸巨礮于櫻埒，擢用韭山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免高

<sup>90</sup> 前揭《海国图志》，p. 1。

<sup>91</sup>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一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p. 39。转引自前揭《〈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及影响之比较》，p. 25。

<sup>92</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p. 301~302。

岛四郎大夫之禁锢，召土佐漂民万次郎，皆使之属江川，特下夷书于列侯群吏以复答所议。……下田是我邦喜望峰，船舶必由之港，今成夷占据之所，则海路梗塞。伊豆之地山峻道阻，下田在其最南斗出之处，一旦起事，陆路出兵，则受阻于峻阻；而海路则我无与坚舰相敌之物。<sup>93</sup>

“下田事件”后，吉田松阴为此入了狱。美国佩理将军率舰来港后，军舰停在了下田。下田则是日本的“喜望峰”，扼守此处，则日本的“海路梗塞”。在此之前，松阴已经递送给藩主《将及私言》等九篇，因属于越级呈报，未被采用。但松阴仍然我行我素，一边上书陈情，一边下田踏海、用实际行动呼吁了解外夷、抗击外夷。所以，他呼吁幕府要大修武备，还要废除建造大船的禁令<sup>94</sup>。不仅要让荷兰人出资军舰、火轮船，还要让浦贺的中岛三郎助依西洋书籍的样子打造军舰，筑炮台于品海、铸巨炮于樱埭，“擢用韭山代官江川太郎左卫门、免高岛四郎大夫之禁锢，召土佐漂民万次郎，皆使之属江川”，所谓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样，对下田可能发生的战事也可有个预防，以免陆路、海路都受“夷狄”所扼。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走出去”的思路：

国有异制，人有新意固矣，苟有俊才巧思之人，周游诸国，历观名城坚寨，又与彼所谓筑城家者辩论讲究，必求至极。然后起伏见之大城，以为诸道之模范，使其稍稍改筑斯可也。不然，徒恃二百年前之遗制，以当弹丸雨集之衝，不亦危乎？<sup>95</sup>

松阴认为应当派遣优秀人才到国外直接学习，一旦有战事，城市的攻防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让优秀的人才出去学习，“历观名城坚寨”，甚至“与彼所谓筑城家者辩论讲究”而“求至极”，然后回来“起伏见之大城，以为诸道之模范，使其稍稍改筑斯可也”。否则，以现有的传统的上古稻草堆积成的古城战法是无法抵御外敌的。

同时，他还提出了建立兵校：

大城之下，宜兴兵学校，教诸道之士。学校中置操演场，习炮枪步骑之法，立方言科，讲荷兰及鲁西亚·米利坚·英吉利诸国之书。炮枪步骑本邦固有可用之物，更求荷兰诸国之法，以补其未备之所。荷兰之学大行于世，至鲁西亚·米利坚·英吉利之书，未闻有善读者。见今诸国之舰交至吾邦，吾邦人乃可为不谙其方言耶？且技艺之流，器械之制，诸国各有新法妙思，经荷兰译选来者，亦可观以其概。<sup>96</sup>

吉田松阴认为，在自己造舰铸炮的同时，还必须设立自己的现代化军事学校。不仅要操练基本的“习炮枪步骑”等军事课程，还要学习“方言”、也即外国语。松阴看到了外国船只交替来港，所以他发出了“我们怎么可以没有懂外语的人呢”？因此，他提出所用教材应该是俄国、美国、英国的原版教材。虽然日本原本也有“习炮枪步骑”，但通过学习荷兰诸国之法，可以弥补自己原本的不足。况且技艺之流，器械之制，各国各有新法妙思，经荷兰译选进来的，大致也可以知道个大概。

针对松阴的“炮枪步骑本邦固有可用之物”，其师佐久间象山评说道：炮枪步骑以余观之，本邦古法在今时，无一可用者<sup>97</sup>。这里显示了两人对日本固有的“炮枪步骑”的不同看法。佐久间是有名的兰学者，他为了铸造大炮，甚至不惜自己去学习荷兰语，以便直接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从荷兰语的资料、或者由荷兰语翻译过来的资料里查找适合日本的火炮予以铸造<sup>98</sup>。因此，

<sup>93</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p. 334~336。

<sup>94</sup> 宽永15年（1638），家光诸侯下令禁止建造百石积以上的大船。嘉永6年（1853）9月15日解禁。

<sup>95</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p. 343~344。

<sup>96</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 344。

<sup>97</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 344。

<sup>98</sup> 佐久间象山在《省督録》里说：“夷吏俗者，莫如先知夷情。知夷情者，莫如先通夷语。故通夷语者，不惟

佐久间相对于松阴，要对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多。

不仅是自己建立学校还可以选派优秀俊才学习后回去当教师：

今宜遣各国俊才，使购其国之书、求其之学术，可因立其人为学校之教员。又使漂民之归国、求夷人之投化者，亦于学校中置之，问其闻见知识之所，则广益之方也。……故使诸道伯侯，每万石贡才士一人，留学三五年，又有出巧思创新制者，额外贡之，遍广其传，亦广益之方也。今之急务，安有此过？

船舰於海国，可譬之于兽之有足、鸟之有翼。幕府惩癸丑之变而除大船之禁，可谓知急务。然西洋之制，遽未可易得。依洋书制之，虽形恰似，施用则违。命兰夷购置于海外，兰夷也未速报。平象山有佃于海外船匠之说，使遣人于海外而从便宜事，以有购军舰之说。二说并当今之急务，而未施行。今或先遣一俊才以海外，廉知造船卖船之所处，然后行前二说，举事而庶败坠焉。<sup>99</sup>

这里是说，各藩每万石出俊才一人以留学三五年，如“有出巧思创新制者”，可以额外提供名额，“购其国之书、求其之学术”，还可“为学校之教员”，可见松阴对教育的重视。此外，还可以让那些因出海被剥夺藩籍（国籍）的“漂民”回来、让那些规划的洋人也置于学校教书，利用他们的学识与所见所闻。虽然幕府适应形势解除了“造大船”的禁令，但依洋书制造，虽有形状相似，可正真使用起来却另当别论了。让荷兰人帮着购船舰，也未见有什么音讯。象山先生倒是有雇海外船匠之说，还有派人去海外购船之说。虽然这都是当前之急务，但都未见实施。所以，不妨先派遣一青年俊才于海外，打探造船、卖船之事，然后再行前面说的“佣船匠”、“购船舰”之事。

实施了二百多年的“造大船”的禁令，在佩里来港之后被废除了，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西洋书籍的记载去造船倒是不难，但是否正真能用就难说了。所以，派遣青年俊才出海学习、让懂得西洋的“漂民”、洋人归化者任教，教出学生来才是大事。松阴在这里表现出了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先驱者的智慧<sup>100</sup>。

他甚至提出了“海外补偿论”，把日本在欧美那里损失的，要在朝鲜、满洲、南洋那里补回来：

日不升则月，月不盈则亏，国不隆则替。故善得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所无。故善保国者，不徒勿失其所有，又在增其所无。今应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蝦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奉贡如在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可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sup>101</sup>

吉田松阴在这里说，就像太阳一定会升起，月满则一定会亏一样，国家也一定会由荣而衰。因此，想要保卫国家，就不仅是要让既有的不丢失，更需要增加其原先没有的东西。现在如果赶紧急修武备、立造船舰的计划，则一定能开拓北海道、封建诸侯、乘机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训谕琉球朝觐、责朝鲜纳贡、割北边的满洲之地、收南边的台湾、（菲律宾）吕宋诸岛，

为知彼之阶梯，亦取彼之先务也”；又说“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固也。然知己知彼，在今时，未可言战。悉善彼之所善，而不丧己之所能，然后始可以言战”。《日本思想大系 55·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岩波書店、1971年、pp. 414~415。转引自郭丽《幕末日本的西洋认识——开国论者的视角》、《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9年12月、p. 54。

<sup>99</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p. 345~346。

<sup>100</sup> 国际视野，也有学者认为是国际认识、或国际感觉。比如京都大学青谷正妥助教授认为，所谓“国际感觉”就是：①超越国境、文化、知己知彼；②能将其运用到对话上；③具有多国、多文化间的问题解决能力青谷正妥『21世紀の国際感覚』（<http://cfse.ryugaku.kyoto.u.ac.jp/aotani.html>）。转引自川口雅昭《吉田松阴的国际感觉》、人间环境大学编《艺》第一号、p. 2。

<sup>101</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p. 350~351。

取渐进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周围，则一定可以“善保国矣”。

他在狱中给他哥哥的一封信里则说得更加明白：

（我与）俄、美讲和已定，决然不可由我破之，失信于戎狄。但须严章程、厚信义，期间以养国力、随取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又偿之于鲜、满之地。<sup>102</sup>

这就是吉田松阴著名的“海外补偿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吉田松阴所提出的“失之于欧美、补之于鲜、满”的策略。由于当时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以与俄、美相抗，于是他就提出了“日本损失给欧美的部分，应从朝鲜、满洲和中国夺取土地已作补偿、并养精蓄锐、以图保国”的方略，并乘机开拓北海道、占领琉球、使朝鲜从属于自己、进而南取台湾、吕宋，以呈进取之势。因为当时的日本现状，吉田的这个策略在当时来说可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当时并未为幕府采纳，但其“补偿论”方略却可谓近代日本“征韩论”的先导，也为明治新政府的对华策略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铸炮造舰、设立军校、派遣优秀学生学习先进的技术、甚至扩张版图的“海外补偿论”等等以外，吉田松阴还想到了“用间”之策。所谓“用间”，也就是“间谍”之事：

军之用间，犹人之有耳目。无耳何以听，无目何以视。用间于军，何独只视听耳。我自固用之，彼亦用之，军之常也。故善战者，忧我不至用之，而恐彼用之。今则不然。宜用间于彼，虑洩其国事而不敢用。彼用间于我，我宜留以为反间，惧窥其国情而不为。噫，何其惑矣！我为实，则彼虽有百间亦如何于我？我为虚，则彼虽无一间我安能永存？强者不用间，则不知所宜趋。弱者不用间，则不知所宜避。<sup>103</sup>

间谍犹如“人之有耳目。无耳何以听，无目何以视”？所以，国与国之间使用间谍，是“军之常也”。之前担心的是我不用、而敌方用。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不用，担心的是泄密；敌方不用，担心的是被我反间利用、刺探其国情。如我强，则敌人纵有再多的间谍也无济于事；若我弱，即使敌人不用一间谍，我又能怎么安生永存？因此，他认为“强者不用间，则不知所宜趋。弱者不用间，则不知所宜避”。

吉田松阴在这里强调了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利弊，也揭示了国与国之间实力抗衡的逻辑。他的这些思想，显然，与其作为家学的山鹿流兵学师范有关，他在讲解《武教全书》时都曾经对用士、守城、用间等予以过说明讲解<sup>104</sup>。

或许正如河上彻太郎说的那样，松阴当时不过是一个锁国时代从地方来到都市的小武士而已，并且他的20岁的大好时光又几乎都在监狱里度过的。因此，以松阴当时所知道的国际形势所得出的“国际感觉”的认知，其水平或许还不如现今的一个小学生。其国际感觉呀、世界知识什么的，远不如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说起来他的对外认识还是来源于佐久间象山的教导呢。但就像在其他点上一样，松阴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是全身心地身体力行的<sup>105</sup>。

在这里，河上认为松阴的“国际认识”同样是“实践性”的。他不象当时一般人那样，仅仅只是理论上进行论述，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现自己对外界世界的认知。将及私言、下田事件、刺杀间部……等等，无不是用实际行动在进行“实践”。

#### 四、结语

日本在被迫开国时正好赶上清朝的鸦片战争战败不久，他们期望能从大清的战败中学习

<sup>102</sup> 「狱是帖」、《全集》（普及版）第八卷所收、p. 423。这是安政二年（1854）四月二十四日写给其兄衫梅太郎的信。当时，松阴在野山狱中，其兄在狱松本。

<sup>103</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p. 352~353。

<sup>104</sup> 《全集》（普及版）第一卷、pp. 79~114。

<sup>105</sup> 河上彻太郎『吉田松陰——武士と儒による人間像』、中公文庫、1979年11月、pp. 108~109。

一些什么。这时，魏源的《海国图志》传了进来。这给不少摸不着头脑的幕末之士看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不少原本是攘夷派的人转而成为了开国派<sup>106</sup>。

学界几乎都认为吉田松阴也属于受魏源《海国图志》影响的一员。但我们查看了吉田松阴的全集，发现直接论述与魏源《海国图志》有关的，只有两篇，而更多的则是松阴自己的思想。很多甚至都是在松阴接触到《海国图志》之前的。比如《将及私言》、《幽囚录》等。

《幽囚录》几乎完整地记录了他面对外敌时的各类方策。从铸造炮舰、设立军校、派遣优秀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甚至扩张版图的“海外补偿”论……等等，吉田松阴在学习西方观念的同时，并未一味地盲从，也不漠视外国。尤其在魏源的《海国图志》进入日本以后，并未如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一味地叫好、人云亦云，而是按日本的实际情况，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讲述了自己的整套御敌方策。

正如大谷敏夫所说的《海国图志》“成为‘幕末’日本了解列强实力的必备文献，供作随手翻查之用。于是，私塾也从此用做教材……中国与日本都面对着欧美列强的侵入，处在开国与否的十字路口，‘幕末’时期日本人的开明派，如饥似渴地读《海国图志》，他们从书中获得有关欧美列强的知识；反过来，中国人除一部分开明派外，对此著作的研究，似乎颇难进展”<sup>107</sup>那样，尽管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确实给幕末日本社会了解西方、以及如何对待西洋列强带来了一定的方便，但我们从吉田松阴对此的解读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一味地全盘接受，有的甚至还全盘否定。如果说吉田松阴的老师佐久间象山还把魏源称作同时代的外国“同志”的话，吉田松阴则显然批评的内容要多得多了。不仅如此，早在吉田松阴接触到《海国图志》之前，他已经向藩主呈现了自己的“将及私言”等“意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与魏源思想的异同。

在中国发生洋务运动之前，魏源的“以夷制夷”思想显然并不为人接受，甚至还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嘲讽。造成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传播效果的原因，学界也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但有一点倒是需要说明的，那就是，由于日本兰学的盛行，当时已有很多西方相关的地理、历史书籍。又由于同时幕末在商业上也开始了逐步发展，并非因为《海国图志》进入日本以后才使得日本开始重视商贸活动的。至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中，大都把视点放在了“海防论”上。事实上，从当时日本翻刻《海国图志》的内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总之，《海国图志》日本翻刻本的卷目很少，地理知识方面的内容有限，而《筹海篇》《澳门月报》等海防相关篇目得到了广泛翻刻。翻刻本没有对原书中世界地理知识的内容做系统翻刻，仅选取了美、英等少数国别进行了重点翻刻。翻刻美国、英国部分应该是与当时日本所面临的美国“佩里来航”外交压力有关；而翻刻《筹海篇》等海防篇目也是为了应对列强势力。所以，从翻刻本的篇目可以看出，日本翻刻《海国图志》的目的应是为应对当时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提供参考，而不是通过《海国图志》了解世界地理知识。《海国图志》这部“地志”特征明显的书籍，在日本其地理方面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sup>108</sup>

就是说，日本翻刻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很有目的性、实用性的，即全本翻译不多，因为用不着。那就只翻刻用得着的“海防论”、英、美、俄等国的历史、地理等，而这几个国家正好是当时给日本最大危险的。

但是，正如容应夔说的那样<sup>109</sup>：

<sup>106</sup> “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方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海国图志》。”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中译本p.214。转引自郁玉松《〈海国图志〉的重要思想及其对日本社会的影响》、《邵阳学院学报》、2011年8月、p.15。其他如陈伟平《横井小楠思想简论》、《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pp.66~71等。

<sup>107</sup> 前揭《〈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pp.53~57。

<sup>108</sup> 前揭《〈海国图志〉对日本影响新辩》、p.55。

<sup>109</sup> 前揭《〈海国图志〉与日本明治维新》、pp.84~85。

《海国图志》的意义不在其内容所要介绍的西洋知识,而是在其表现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史,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表现。日本成功地导入了西洋的长技,达成“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不只维护了日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更先后战胜中国和俄国从而获得和西欧列强同等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地位。但日本并不满足,亦不因此而消失对欧美列强的警戒心。日本始终没有忘记或放弃“师夷长技”的真正和最终目标——“制夷”。明治国家的结局是对西洋的还击和挑战——太平洋战争的悲剧。

因此,无论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及志士的思想是否魏源思想影响的直接或间接产物,又或只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的结果,他们之引魏源为同志,对其思想产生共鸣,以此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和论点,却是不容置疑的。至于的日本广被接纳的魏源思想,反而在清末中国得不到应有地位的事实,更是可以作为中日近代化的不同道途的一个解释。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海国图志》带给日本的不只是地理知识和如何进行贸易,而是如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尤其是真正的目的在于“制夷”这点上。——或许这才是横井小楠从一个坚定的“攘夷”者进而转向“开国派”的原因所在吧。也或许正因为此,才使得吉田松阴觉得魏源的“制夷”与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制夷”御敌方策重叠、或者不同,所以,松阴对魏源思想有不同看法并予以批评也是很自然的了。

如果魏源的《海国图志》给予松阴以很大的影响,以松阴的性格,不会不发感叹与议论,也不会只写两篇感叹文章的。因此,可以说,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确实影响了不少人,在开阔日本人当时的国际视野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的开国还是攘夷上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就吉田松阴个人而言,其受魏源的影响,并未如学界认为的那样大。相反,由于吉田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对外思想、方针、决策,而并未完全受《海国图志》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予了的否定与批判。